

理解「中國」：1949年來的兩次大轉型

講者：何艷玲

廣州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
廣州中山大學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2012年6月12日



何艷玲教授為廣州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的教授，同時擔任該校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的常務副主任。因為職務關係，何教授常常有機會為廣東地區甚至其他中國地區的官員進行演講，由於經常與官員接觸的關係，對於中國的政治也有相當深刻的認識與見解。

理解中國的前提

何教授認為目前中國到達一個前所未有的「熱鬧」，包括各種群體性事件的出現以及中央的各種回應，看似充滿各式各樣的爭吵，其實是缺乏爭論的。何教授進一步比喻所謂的爭吵就是「鷄同鴨講」，就是鷄同鴨講鷄的語言，鴨同鷄講鴨的語言，但彼此並不是處在同一套話語體系中，不可能會有共識也不可能共同行動。何教授對此現象感到憂心，認為這樣的爭吵其實掩蓋了真正急需解決的問題。何教授舉了一個例子，目前中國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新媒體——如微博等

網路工具的誕生，民意表達的技術在廣、深度都有進一步的提升，藉此產生出來的熱鬧民意，是許多學者所關注的現象，有些學者甚至認為這象徵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社會開始對國家有了反制的力量。然而，何教授思考的是，在這樣熱鬧民意的背後，是否真為西方意義中的現代公民社會所對國家發出的警惕和反抗？還是中國傳統秩序中窮人對於富人的不滿和仇恨呢？兩者表現形式可能一樣，但解讀背後的意義卻大為不同。儘管何教授沒有一個明確的結論，但是認為中國目前並不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而是缺乏提出問題的能力。

何教授認為這也是中國吊詭的地方，中國有許多現象可以用西方現代理論去框定它，但事實真的是如研究者所看見的那樣嗎？何教授認為這也說明了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悖論沒辦法用理論去解釋，但是如果用中國的視角去看是很正常的，這也是他者和我者的視角區別。舉例來說，有一個留學國外回來的學者，看見了兩張麵包包著肉長得有點像漢堡，但跟漢堡又不太一樣，所以就叫它「中國式的漢堡」，但事實上中國人都叫它「包子」。同樣道理，有些人認為中國存在公民社會，但這跟西方公民社會的概念似乎不同，那麼就把它叫做中國式的公民社會。亦即，一味套用西方理論的解釋框架，將侷限我們對中國社會的理解。

現今的中國是經過一個黨建「國」的過程，因此當1949年「國」被建成後，維持「黨的唯一合法性」就成了這個國家最為重要的邏輯；在政治上的制度安排建立了一個黨國體制，在經濟上的制度安排則實行計畫經濟。不過隨著計畫經濟

體制內部的低效率缺陷，造成黨國體系無法建立與資產階級國家競爭的優勢，違背社會主義國家比資本主義國家生產上更有優勢的論述，引發出黨國體系的合法性危機，因而誘發中國的第一次轉型。何教授進一步強調，即使計畫經濟帶給中國低效率的生產體系，也不一定造成改革或轉型，真正的原因在於這種低效率造成黨國體系無法建立與資產階級國家競爭的優勢，使得黨作為國家代理人的合法性受到嚴重質疑，這種合法性的危機才會促使轉型的發生。何教授認為在中國的第一次轉型過程中所發生的許多變革，不管是向左傾還是向右傾，它要保持一個能夠為人民當家作主的黨國體系的邏輯始終沒有改變。

第一次轉型：向市場經濟轉型

第一次轉型的關鍵是從計畫經濟轉到市場經濟，國家面臨的挑戰便是如何重新建立一個可以跟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競爭的發展模式。這樣的轉型確實創造了所謂的「中國奇蹟」，緩解了黨國合法性的危機，不過準確地說這是一種「市場奇蹟」。在創造奇蹟的同時也埋下了很多隱患，何教授歸納為一個陷阱、兩個誤區及幾個結果。

「一個陷阱」在於黨國體系雖一手催生了資本主義，國家與資本的親近性卻造成服務資本與服務社會的矛盾。「兩個誤區」分別是：一、國家沒有對市場建立一個嚴格的監管體系，導致市場嚴重失靈，包括通過公共資源的國企改革，但利潤卻私人化了，或者未能建立一個劫富濟貧的再分配體系，造成中國下流社會化。二、國家僅對市場放權，卻對社會採取不放權的態度，國家利用強大的資源壓制社會，使得國家與社會造成緊張感。當多元化社會面對一元化政治，在國家未建立匹配多元化所帶來的吸納機制下，國家傾向將社會問題政治化，徒然樹立敵人且虛耗巨大財政進行政治維穩。於是第一次轉型產生了三大困境：改革與社會不平等、改革與社會不信任以及改革與社會不穩定，這些困境不斷侵蝕改革的正當性，導致第二次轉型發生的必然性結果。

第二次轉型：向和諧社會轉型

由於第一次轉型造成的社會不穩定，威脅到黨國體制的合法性，所以從國家層面上，國家主席胡錦濤公開表示要不顧一切地維護社會穩定。何教授解釋，過去地方政府長期被經濟增長綁架，現在則是被社會綁架，說明著中國第二次轉型已經開始了，逐漸從市場轉型到社會。而這次轉型的分界點，何教授定為 2004 年中共中央官方文件首次出現「和諧社會」詞語。這次轉型最大的挑戰來自於人民對國家的高度不信任，對於改革有不同的聲音，對國家本身形成的強大壓力。

第二次轉型共有五大考驗：領導力考驗方面，不再通過革命取得正當性的新領袖，使得領導集團內部的分裂到達高峰，缺乏一位能夠帶領改革的新領導力。吸納力考驗方面，多元社會與一元政治之間的張力，國家企圖在話語中解決領導的合法性，如〈三個代表〉，不過何教授認為試圖在一個框架下解決多件事情，終究是無效的。整合力考驗方面，積重難返的改革與層出不窮的抗爭，抗爭者包括改革過程的利益受損者與既得利益者。管制力考驗方面，則是肆虐的市場與脆弱的監管。回應力考驗方面，新媒體的出現使民意表達技術不斷的創新，政府依舊沒有相應的管道來接受這種不斷創新的民意表達。

新國家建設

雖然各種改革的聲音看起來形式很漂亮，然而黨國的邏輯依然沒有改變，大家都知道問題在哪，但是又不能去觸碰它。由於當初建國是一種革命性而非建設性的理由，中國雖然建立了一個有邊界的主權國家，但從沒建立一個制度體系的國家。然而當前轉型中的中國仍須建立一套制度化體系，用以解決國家、市場和社會之間的互動，何教授在此提出「新國家建設」的概念，即制度化的國家建設。但是走向制度化的路是迂迴的，需要兩方面的妥協。第一是制度層面的妥協：如果不能要憲政，至少先法治；如果不能要政黨民主，至少先黨內民主；如果不能分權於民（選

舉），至少先分利於民（民生）。第二是個體層面的妥協：反映了某種政治文化心理，何教授以一句話作為代表，「如果不能幸福的活著至少有尊嚴的活著，如果不能有尊嚴的活著那至少能活著」，反映了個體對於巨大結構安排的一種妥協。

最後，當下的中國又呈現何種樣貌呢？何教

授認為是西方的現代主義、政黨的革命主義以及傳統的鄉土主義糾纏在一起。當下的中國既非現代中國，也非新中國，更不是舊中國。不過何教授在這裡也特別澄清，自己只能提出否定的性質，還無法真正為中國妄下定論。

（整理：王柏期）